



高等教育精品课程规划教材

中国文化概论

ZHONGGUO WENHUA GAILUN

(第二版)

张秋芝 编著



中国文哲概论

A horizontal row of nine colored squares arranged side-by-side. The colors transition from a dark brown shade on the left to a lighter beige shade on the right, creating a smooth gradient effect.

高等教育精品课程规划教材

中国文化概论

张秋芝 编 著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概论/张秋芝编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2005. 9

ISBN 978-7-5043-4572-1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文化概论—中国 IV. ①H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 002363 号

(第二课)

普 通 艺 术 素 材

高等教育精品课程规划教材

中国文化概论

编 著	张秋芝
责任编辑	贺 明
装帧设计	水木时代(北京)图书中心
监 印	赵 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邮政编码: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蚌埠广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37 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2 版 201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4572-1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修订说明

当前，“文化力”愈来愈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审视历史、剖析自身、创造未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书系高等教育精品课程规划教材之一，编者从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方面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建筑、四大发明、政治、经济、法律、历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本书有助于学生通过认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从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彩，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经审定，本书适合作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课教材，也能满足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研究生入学考试需要，同时还可供作中华传统文化培训教材。

本次修订，除订正一些错讹外，还在原书基础增添了“中国古代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一节内容和“古代艺术”一章内容，调整了部分章节的位置，删减了部分内容，在各章后面增加了“思考题”板块，旨在便于教师和学生进一步思考讨论，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本书在编写及修订过程中，编者吸收、借鉴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不吝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高等教育精品课程规划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
2014年1月

第二编 制度文化

第三章 政治制度及民主法制	(33)
第一节 专制制度	(33)
第二节 民主政治及民主	(33)
第四章 财政制度	(37)
第一节 古代税制的变迁	(37)
第二节 中国太行官署制度	(37)
第五章 科举制度	(37)
第一节 科举制度与隋朝	(37)
第二节 科举制度的演变	(38)
第六章 经济制度	(40)
第一节 土地制度	(40)
第二节 货币制度	(41)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节 文化的含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阶段 ······	(1)
第二节 中华文明延续性的原因 ······	(4)
第三节 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 ······	(6)
第四节 中国历史文化与世界文化 ······	(10)

第一编 物态文化

第一章 建筑文化 ······	(18)
第一节 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 ······	(18)
第二节 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型 ······	(22)
第二章 四大发明 ······	(42)
第一节 造纸术 ······	(42)
第二节 火药 ······	(45)
第三节 指南针 ······	(48)
第四节 印刷术 ······	(49)

第二编 制度文化

第三章 宗法制度及君主专制制度 ······	(54)
第一节 宗法制概述 ······	(54)
第二节 君主专制制度概述 ······	(57)
第四章 官僚制度 ······	(62)
第一节 官僚机构的设立 ······	(62)
第二节 中国古代官员的政绩考核 ······	(72)
第五章 科举制度 ······	(76)
第一节 选官制度与科举制度 ······	(76)
第二节 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	(82)
第六章 经济制度 ······	(86)
第一节 土地制度 ······	(86)
第二节 赋役制度 ······	(91)

• 2 • 目 录

第七章 古代法律制度	(97)
第一节 奴隶制法律制度	(97)
第二节 封建制法律制度	(98)
第八章 历法制度	(101)
第一节 中国古代历法知识常识	(101)
第二节 中国主要历法	(103)

第三编 行为文化(礼俗文化)

第九章 古代称号	(110)
第一节 古代姓名字号	(110)
第二节 古代历史朝代称号	(112)
第三节 古代帝王称号	(114)
第十章 古代礼俗	(116)
第一节 古代的吉、嘉、宾、军礼	(116)
第二节 古代的凶礼	(119)
第三节 古代的婚礼	(123)
第四节 节日习俗	(126)

第四编 精神文化

第十一章 儒家文化	(130)
第一节 先秦原始儒学	(130)
第二节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改造	(138)
第三节 宋明性理之学的儒学	(140)
第四节 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43)
第十二章 道家文化	(145)
第一节 老庄之学	(145)
第二节 黄老之学	(151)
第三节 魏晋玄学	(152)
第四节 道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55)
第十三章 佛教文化	(157)
第一节 两汉时佛教的初传	(157)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	(158)
第三节 隋唐佛教的鼎盛	(160)
第四节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66)

第十四章 道教文化	(170)
第一节 东汉道教的创立	(170)
第二节 两晋至宋金元道教的发展	(171)
第三节 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78)
第十五章 古代文学	(181)
第一节 古典诗词	(181)
第二节 古典小说	(188)
第十六章 古代艺术	(192)
第一节 古代音乐	(192)
第二节 古代绘画	(201)
主要参考书目	(209)

第一 一、‘文化’的含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阶段

一、‘文化’界说

本书将着重从中国历史、先秦两汉道教思想、唐宋明清史学文化摘要的三个视角，使人们更具体、更深入地了解儒家名著的立场上，儒家气的歷史過程中，中华民族是怎样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真善美历史文化”，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文化特征。因此，首先应该对“文化”概念进行简要的界定，即“中国”的古文作简要的说明。

“九”谓定义，“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叫何谓《说文·指事》中写道：“凡氏之属，皆不肅也。文化不敬，故后加肃。”四者兼备全称“礼”。“前有礼，中写道。”文化为儒，武为外急。”唐朝齐文祖、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到：“既无礼乐以足，序者犯而失礼。”其中“文化”的含义即指封建王朝的“文治教化”。由今书直译为文化巨人，与“武功”相对而言。大体说来，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了解文明的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勇猛”相对应。不过，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瑞典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威斯于196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科学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00多种。但是，众多关于“文化”的定义，从总方面看，不外乎狭义和广义两种。卡尔·阿都百特编著1971年版的文化下的一般性定义是：文化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新华大词典》书1983年版的广义的文化是：“文化是社会地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进行生活和活动的各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现代学者顾雍在《中国文化精粹》一书中用一句十分形象的话来概括广义的文化：“文化即是时间积累下来的集体公共人生。”我们把各种关于文化的广泛义项合在一起，可以说，文化是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沉淀下来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续的总和。这正是必须把握三个要点了：文化是时间积累的，文化是集体的，文化是公共的。

绪 论

正所谓：彬彬哉！吾文明！五千余岁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

悠悠华夏史，上下五千年，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如黄河、长江之水奔流不息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据考古学界分析，全世界存在着源头相对独立的六大古老文明体系，它们分别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墨西哥文明、秘鲁文明。在六大古老文明体系中，唯有源远流长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一直生气勃勃，而且代有高峰，蔚为壮观，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站在世界文化的前列，是世界上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文化。现在，中国文化不仅积淀着深厚的底蕴，而且焕发出新的生机，以更加坚实的步伐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第一节 文化的含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阶段

一、“文化”界说

本书意在展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致风貌，探讨中国历史文化演变的基本规律，使人们更具体、更深入地了解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是怎样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形成了至今犹存的文化特征。因此，首先应该对“文化”的概念作简要的界定，对“中国”的含义作简要的说明。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西晋束皙在《补亡诗·由仪》中写道：“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敷文化以柔远，泽普汜而无私。”其中“文化”的含义均指封建王朝的“文治教化”，用诗书礼乐等教化世人，与“武功”相对而言。大体说来，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

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但是，众多关于“文化”的定义，从总的方面看，不外乎狭义和广义两类。《不列颠百科全书》1974年版给文化下的一般性定义是：文化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苏联大百科全书》1973年版给广义的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现代学者钱穆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用一句十分形象的话来概括广义的文化：“文化即是长时期的大群集体公共人生。”我们把各种关于文化的广义定义综合在一起，可以说：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这个定义应把握三个要点：广义文

化是与人类的创造活动相联系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广义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涵盖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是一个传承发展的综合概念;广义文化的外延涵盖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全部。

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它着重指人的心态部分。其实,人类文化很难将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截然分开。一切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创造物,都凝聚着创造者的观念、智慧、意志,这些属于精神的因素。我们设置狭义文化概念的目的,是要排除纯粹的物化自然世界,把眼光集中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以此来观察人类自身。狭义的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累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的总体体系。这个定义也要把握三个要点:狭义文化不但以人为中心,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即使观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的;狭义文化关注的不是个别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经历史传承累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狭义文化关注的不仅是全人类的普遍共性,而且更注重不同民族、阶层、集团人文精神的特点。

本书所讨论的“文化”,力求古今贯通,中西汇合,侧重于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为物态文化,或称“物质文化”。所谓“物态文化”,是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所构成的文化,包括人类加工创制的各种器具,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也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例如,人们衣、食、住、行所凭借的物质条件。物态文化是文化整体(包括下文所说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等)的物质基础,一定时代物态文化往往与这个时代其他层面的文化发展相互协调。例如,唐代国势鼎盛、气度恢宏的文化便基于坚实的物质基础,诚如诗人杜甫在《忆昔二首》其二中所描绘的那样:“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第二个层面为制度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各种行为规范、准则以及各种组织形式所构成的文化。制度文化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等。

第三个层面为行为文化。所谓“行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中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往往是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出现的行为规范。例如我国传统节日习俗中,除夕夜吃团圆饭,元宵节赏灯,清明节扫墓,端午节包粽子和划龙舟,中秋节赏月并吃月饼,重阳节登高、赏菊等。

第四个层面是心态文化,或称“精神文化”、“社会意识”。所谓“心态文化”,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这些都是文化整体中的核心部分,如儒家、道家、墨家等哲学思想,再如《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艺术,又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

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各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推动,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结构。

二、“中国”的含义

以上为“文化”的界定,再说“中国”的含义。

“中国”,古时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指京师为中国。《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汉代毛亨传:“中国,京师也”。又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夫而后之

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东汉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在这里，“国”是都邑的同义词，中国就是天子所居的城，与四方诸侯对举。二是指华夏族、汉族居住的地区。例如，《诗经·小雅·六月序》中说：“《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又如《礼记·中庸》中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此处“中国”也是指华夏族所在地区。

与“中国”含义相同的有“中华”，如《魏书·宕昌羌传》中说：“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其初，“中华”仅指黄河中下游而言，后来，随着各朝疆土不断扩大，凡所统辖，皆称“中华”，这时“中华”一词才与“中国”、“中原”等同义。“中华”不仅局限于地域或种族的意义，人们还发掘出“中华”的文化内涵，如《唐律释文》（王元亮重编）卷三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又如章太炎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

与“中国”相同含义的还有“华夏”。华夏，古代汉族的自称，亦作“诸夏”。“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华夏族的始祖是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后来黄帝族后裔中的一支进入今山西南部，创造了夏文化，就称夏族。夏族进入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即夏朝。黄帝族经过夏、周两代与戎、狄、蛮、夷（所谓“四夷”）等其他各族的冲突、交往与融合，文化礼俗等方面的差别日趋减少，到战国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中国称“华夏”，带有礼仪文化的色彩。如《左传·定公十年》中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解：“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华夏一也。”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先后建立了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但是中国古代所有的朝代都不以中国为名，又都以中国通称。至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均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简称是“中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9月）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疆界划分和两国人民归属的称谓，对其中一方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来称呼。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首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用来专指我国全部领土。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首次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三、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阶段

我们要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不仅要知道“中国”二字的含义，还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阶段。大体说来，中国传统文化演变的历史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原始期。原始社会的文化为原始期。早期中国文化的起点，可以上溯到170万年以前，其标志之一是“元谋人”。这个时期主要有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

（2）萌芽期。夏、商、西周时期的的文化为萌芽期。先是夏代神学迷信盛行，后是商代尊天事鬼，继之以西周强调天命与德（“德”就是指敬天、孝祖、保民），大多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

（3）雏形期。春秋战国时期为文化的雏形期。这时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创立了儒、墨、道、法、阴阳、纵横、名、农、杂各家学派，成为中国文化的多种源头。其中以儒、墨两家为显学，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

(4)定型期。秦汉时期为文化的定型期。秦始皇建立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国家制度一直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汉代不仅沿袭秦朝各种制度,还确定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这时的文化带有制度化、模式化和程序化的特征。

(5)多元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文化的多元期。这个时期大多处于分裂局面,中央集权不复存在。在这动乱的时世中,礼法相对松弛,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等相互颉颃与冲突,胡、汉文化并存与碰撞,其中有交融,也有变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6)鼎盛期。隋唐时期为文化的鼎盛期。尤其是唐代前期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出现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最文明的国家之一。统治者以高度的自尊与自信,在文化上采取开放与兼容的态度,因而道教风行,佛教兴旺,儒学昌明,基督教之一的景教也在贞观年间传入中国,胡汉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达到高峰。

(7)强化期。宋明时期为文化的强化期。北宋为了加强皇权,以枢密使掌军政,三司使掌财政,而宰相只管民事。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废丞相,设内阁,使政、军、法三权集中于皇帝一身,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而宋明理学的勃兴,使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带有不同于以往的哲理性与思辨性,以及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自觉性等特点。

(8)转型期。从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时期为文化的转型期,表现为封建文化由烂熟到衰落,启蒙思想在曲折中推进。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包括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等层面,又经历了原始期、萌芽期、雏形期、定型期、多元期、鼎盛期、强化期、转型期等阶段,内容丰富,气势恢宏,蕴涵深刻,形式多样,其中有许许多多值得继承的宝贵遗产和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因而,学习与弘扬中国优秀文化,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节 中华文明延续性的原因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指出世界上曾有许多辉煌的文明,直到现在还兴旺发达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且连绵不断,这是欧美文明所鞭长莫及的。那么,中国文明为何会有如此古老,且又如此连续的生命力呢?究其原因,可谓错综复杂。

一、取决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

中国地域辽阔,四周都有天然阻隔。西北的帕米尔高原,是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等交汇而成的大山群。这一带气候寒冷,冰川发达,雪海浩瀚,风沙猛烈。唐代诗人岑参在《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诗中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这种景象:“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虽然在西汉时已奠定了经过戈壁沙漠的“丝绸之路”,将中国古代丝绸等运到中亚、西亚、欧洲,传到古代罗马帝国,轰动西方。但西北地区山路崎岖,山岭阻隔,加之高寒干旱,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地理极限。西面和西南面耸立着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昆仑山,祁连山及横断山脉环绕,往往高峰林立,壁立千仞,地高天寒,空气稀薄。其中,如横断山脉,岭谷并列,山高谷深,水流湍急,瀑布飞泻,形成一道道天然屏障。

深，具有两山夹一谷、两谷衬一山的地形，对东西交通往来阻碍极大。喜马拉雅，藏语意为“冰雪之乡”。主脉大喜马拉雅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山势巍峨峭拔，雪峰重叠。主峰珠穆朗玛峰，突出于群山之上，海拔8848.13米，是世界上第一高峰。喜马拉雅山构成青藏高原的边缘，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山脉，成为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天然分界。东面是近代欧洲开辟新航路后才能逾越的浩瀚太平洋。从黑龙江东部沿海至东南沿海有延绵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北面和西北面为广袤无垠的草原与沙漠，长城内外是历史上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斗争与融合的场地，其外缘以萨彦岭、贝加尔湖、大兴安岭一线为限，再往北因为是严寒冻原，人迹罕至。同时，古代人民为了防止凶险而又可怕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修筑的万里长城更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和隔绝作用的妙处就在于，中国不像地中海和印度半岛的文明那样易受外来入侵，能够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文明，使中国文明比欧亚其他伟大文明诸如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之类，更为连绵不断。

广阔的地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回旋的舞台。世界古代文明中，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被毁灭的原因很多，有一点应当是与其地理条件有关的。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周围，是大片的沙漠，人类能够生存的空间太狭窄，因此人们之间为争夺生存居住地的斗争很频繁。在中国，中华文化虽然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是黄河流域以外广大的地域为其准备了潜在的发展空间：每当遇到北方边地民族大举南进的时候，中原文化人群都有一个南国作为他们的后方。因此每当北方进入民族融合的时候，南方则进入开发的高潮期。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南方的经济高潮与北方的剧烈的民族融合同时并举，构成南北不同的历史景观。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同时充当着这种文化高潮的两大历史舞台。广阔的回旋舞台，是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的前提条件之一。

二、取决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方式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农业被誉为文明之母，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是由人类的“采食经济”向“产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世界上传统的经济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农耕经济，二是游牧经济，三是商业经济。中国传统的经济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因而造就了中国农业文化的若干特征：(1)勤劳务实。农业生产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而中国古代人民养成了勤劳务实的精神。(2)安土重迁。农耕生活和土地相连，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人们把搬迁看得重，不随便迁移。“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天长地久，福禄永终”，“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等乡土观念得到较多的认同。(3)重农抑商。虽然在中国奴隶社会的城邑中就有商品交易，且明清时期，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作为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以上三个特征保证了中国传统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三、取决于政治上的长期统一局面

与历史上众多文明长期处于城邦林立或群雄割据相比，中国很早就确立了政治上的统一局面。而且，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实现国家统一时间最长的文明。政治上的长期统一对于中华文明的保存和延续具有几个明显的好处：

(1)它使得中国具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中央政府，在这个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既可以有效地

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略,又可以抵挡大型自然灾害的冲击。

(2)它促进了中国的货币、度量衡、文字的统一,这些都是一个文明能够延续久远的重要载体。特别是汉字的统一,集中承载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自秦统一文字以来,两千多年中国的官方文字始终没有改变过,即使遭遇外来文明的冲击甚至入侵,汉字依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字。而记载着古代两河流域辉煌文明的楔形文字与代表克里特早期文明的线性文字,以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在今天之所以几乎成为了一种死文字,只有极少数的考古学家才能够识别,关键原因便在于创立这种文字的民族政权早已不存在了。文字的保存与延续是必须依赖于强大的民族政权做基础的,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3)政治上的统一保证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完整记载。一个文明延续久远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有完整的历史记载。世界上对于本民族的历史记载的最完整、最全面的非中华民族莫属了。

四、取决于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传统

思想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繁衍的遗传基因,它是一个文明能否长期延续下去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国在西汉时期就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起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同时,中华文化本身具有兼容性和巨大的创造力,能够在发展中做到求同存异,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时结合自身的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例如,每个野蛮的北方民族在南方建立政权之后,一开始是想依靠自己的方式实现统治,但往往以失败告终,最后还是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治理百姓的思想和原则。如清朝入关不久,就开始学习汉族文化。这种特性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在与外来文明的竞争中取得胜利,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华文明精髓与本质所在。

五、取决于中国巨大的人口优势

中国从一开始起就拥有了很可观的人口,因为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适宜农业的发展,例如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也因此,中国的土地能够养活众多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中国人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像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整个社会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第三节 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在几千年中巍然独立,除了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外,还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何谓精神?精神本是对形体而言,文化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对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曾经指出:“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

形态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指导中国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这里试举出几点：(1)天人协调的整体精神，(2)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3)厚德载物的崇德精神，(4)求是务实的实际精神。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一、天人协调的整体精神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论述颇多，诸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生的最高理想为天与人之间的协调。它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一方面，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与自然和平共处。另一方面，自然对于人类也不是一个超越的本体，也不是主宰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与人类和平共处的客观对象。西方人较多地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因而侧重于个体与功利，而中国人往往是把世界看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整体，二者之间相互协调，和谐一致，因而往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和与协调。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都是围绕着这种整体精神而展开的。

天人协调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它首先指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其次，表明人类生生不息、则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完美主义和进取精神；第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思维模式的全面性和自新性。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

二、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

《周易大传》提出“刚健”的学说，《象传》云：“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人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这些都是赞扬“刚健”的品德。《说卦》云：“乾，健也，坤，顺也。”“健”是阳气的本性，“顺”是阴气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阳健居于主导的地位。《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

《周易大传》强调“刚健”，主张“自强不息”，这是有深刻意义的精粹思想。从汉代到清代，两千年之中，《周易大传》关于“刚健”和“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积极作用。而道家和部分宋儒的“柔静”学说，则是“刚健”思想的一种补充，两者相互对峙，相互引发，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面貌。

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首先表现为勤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国人特别提倡“勤勉”，如《尚书》中强调“克勤于邦”、“勤思劳体”等。《诗经·小雅·小明》中说：“嗟尔君子，无恒安息。”汉代乐府诗《长歌行》中写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唐代韩愈在《进学解》中倡导勤奋刻苦、持之以恒的精神：“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民间也流传着不少劝人勤奋的谚语和格言：“黄金无种，偏生勤俭人家”；“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等。其次表现为天定胜天。战国时期的荀子认为“天”是自然现象，人们只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就可以“制

天命而用之”，也就是说人能够而且应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因为人具有社会群体性和主观能动性，这就是“人强胜天”、“人众胜天”、“人定胜天”。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以及寓言中的“愚公移山”等，都体现了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精神。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还表现为奋起抗争。“穷而后工”，是说文人处境越困穷，诗就写得越好。“穷当益坚”是说大丈夫处境越困穷，意志应当越坚定。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有许多在逆境中奋斗的志士仁人，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也表现为一种人格理想，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就是孟子所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如晋、宋时代的著名诗人陶渊明正道直行，不慕荣利，愤然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唐代大诗人李白蔑视权贵，不为功名利禄所引诱，大声宣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古往今来，中国人民都把自由自强的精神作为自己的人格追求。

三、厚德载物的崇德精神

春秋时代有“三事”之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即端正品德。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强调进德、厚德、明德等。如《周易·乾卦》中说：“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意思是君子进德修业，要及时有所作为，所以无害。孔子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意思是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庄子·天下篇》中说圣人“以德为本”。《左传》中《僖公十五年》也说“德厚者流光”。“光”，通“广”，意思是德泽厚者影响深远。《大学》也有云：“古人欲明明德（显明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理论，简而言之，就是“厚德载物”，或曰“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但它表达的主要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内圣”，指主体内在的修养，对美德的把握，用《大学》中的话来说，也就是“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指将主体内在的修养所得推广于社会，用《大学》中的话来说，主要是“治国、平天下”，这主要指为政者。为政者之德具体包括正身明法、勤政爱民、举贤任能等。同时，知识分子要讲“士德”，要求对于所学得的知识，必须践履实行，加强自身修养，要有弘毅远大的志向，要有自己的气节，在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危难关头，应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民也要讲“民德”，要求“民德归厚”，要勤劳节俭，“农以耕桑为本，而勤俭又耕桑之本”。商人要讲“商德”，要“义以生利，利以平民”，要遵守“货真价实”、“忠诚守义”等商业道德，还要“以察尽财”，就是说以自己明察智慧去赚钱。只有遵守以上商业道德的商人，才称得上“廉贾”、“诚贾”或“儒商”。为人师表者要讲“师德”，中国古代将“师”与天地君亲并举，所谓“天地君亲师”。师之地位崇高，决定了教师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教职，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教师要“传道、授业、解惑”，要为人师表，要博学知新，要因材施教等。从事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书法、杂艺、舞蹈等艺术工作者要讲“艺德”，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德艺双馨，以诗歌等艺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医生要讲“医德”，要以传说中“尝百草之滋味……以疗民疾”的神农为榜样，视医为“仁术”，“以利济存心”，救死扶伤。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厚德与宽容相互作用，所谓“君子尊贤而容众”，“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同‘导’）人”。宽容是中国传统精神厚德载物的一个具体体现。战国时期文化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与当时较为宽容的文化学术环境有关。《汉书·艺文志》中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例如，齐国稷下学宫，由于齐宣王等君王礼贤下士，对各派兼容并包，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诸家之学，形成稷下学派，稷下成了诸子百家争鸣和思想交流的中心，促进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唐代是一个文化开放、兼容的时代，唐代统治者尊道、礼佛、崇儒，使得道教风行，佛教兴旺，儒学昌明，同时鼓励“三教”展开自由辩论，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氛围。国力强盛的唐朝将“厚德载物”的传统精神推向一个高峰。唐太宗李世民以虚怀纳谏著称于世，在君臣遇合之中施行仁义，实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唐代对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广收博采的恢弘气度，对胡乐、胡舞、胡服、胡食等广泛吸收，出现了“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胡风”盛行局面。中外文化交流也达到高潮，不仅有玄奘西赴天竺求佛法，鉴真和尚东渡日本，而且吸引了日本、朝鲜等很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商人与学问僧，真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中国在这时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转的枢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领世界潮流之先。与此形成鲜明反照的是清朝中后期，统治者盲目自大，以天朝自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的落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发扬“厚德载物”的优良传统，不断综合创新，才能再造辉煌，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求是务实的实际精神

先秦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孔子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对于实际生活中无法验证的事情，他常常采取既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的态度。孔子强调学以致用，经世致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让他处理政事，却办不好；叫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酬酢。纵是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法家也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意即只有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验证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而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兼采儒、墨、名、法、阴阳诸家之长，主张在“究万物之情”的基础上，坚持“因物与合”的思想路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作一切从实际出发，因物变化，因时变化，因地变化。

中国传统文化求是务实的精神内涵很丰富，首先表现为经世致用。孔子强调学以致用，经世致用，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意思是说：读诗，可以抒发情志，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讽喻现实，批判黑暗。近，可以运用其中道理来侍奉父母；远，可以为君主做事。这是侧重以孝与忠来经国济世。荀子也说：“道也者，治之经理（常法）也”，这是以隆礼重法而经世。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以“信史”正世风，救乱世。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其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推究天象与人事之间的关系；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通晓古今史事的变化，以史为鉴，以史经世。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其目的在于使统治者从历代